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专家笔谈(一)

姜大源,石伟平,邬宪伟,高志刚,庄西真

摘要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近期,对中等职业教育地位和发展道路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做法,倍受业界关注。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如何体现;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如何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的作用如何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问题究竟为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将何去何从?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组织“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笔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从政策研究、理论、方法和实践等角度,探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职普比;职业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8)0025-0005-11

再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问题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姜大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其他教育类型不可替代的贡献。回首改革开放40年之征途,可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今天,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反思这一绝非坦途的历史进程,如何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并为这一可能在时间上更为持久的挑战提供多样化的人力资源的教育来说,一个无法回避而不能不讲的话题,就是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职业人才的培养,还需不需要中等职业教育了?

近年来,伴随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滑坡现象,出现了“全面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取消或减少中等职业教育”的声音甚或行动。这些呼吁和现象,可以说直击国家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涉及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涉及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决策的定力问题。

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在改革开放40年中,始终是国家教育政策予以重点关注的大问题。与之相关的国家语境,是一以贯之的。从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0年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决议》、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6年全国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年《教育部关于做好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都对高中阶段的普职比给出了明确的界定。2010年《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指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再次明确指出,要“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2017年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重申“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这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遵国情与国策所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在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正确指引下的结果。毫无疑问,教育政策作为国家主权,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培养所需职业人才的保证。教育的结构和布局,必须基于国家总体全局予以考虑,必须是全国一盘棋而不能各自为政的。教育政策乃国之方略,绝非地方之计;乃国之长远战略,绝非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循规律和本质所致。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都要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第一次工业化,再经历由技术密集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的第二次工业化。与这一进程相应,形了递进式“三阶段”的全发展链结构。而在这全发展链的每一阶段,又构成了由“生产、制造”——“流通、销售”——“服务、配送”这“三环节”组成的全产业链。其中的各环节所需的劳动力结构,表现为初级、中级、高级进阶式“三层级”的全人才链,亦即由劳动密集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向技术密集的洋葱头形结构,再到知识密集型的橄榄形结构逐步演变。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显示,中级人才,即主要是接受过中等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者,在全发展链——全产业链背景下的全人才链中所占比例始终是最大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劳动者。

由此,对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的审视,使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处在第一次工业化的中后期,仍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工业制造业也只是大而远未强,核心技术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国几十年;尽管我国的高校毛入学率已达45%,大大超过许多工业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但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新时代的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技能型人才,却还呈现着一种越来越短缺的趋势。由此,关于中职的基础地位问题,不能只从城市或地区观察,要有全国视野、发展视野。

第一,保持中职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社部调查表明,从总量和结构看,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还不足6%,总量不足,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现象严重。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从体制机制看,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总体不足,培养培训能力滞后,个人发展存在渠道窄、待遇偏低、地位不高等问题。从社会氛围看,“重装备、轻技工;重学历、轻技能;重理论、轻操作”的观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中职是实体经济亟需的一线青年劳动者不可替代的培养基地。新时代的创新型技术工人和新型职业农民等技能型或高技能型人才,已呈现着一种越来越短缺的趋势。

第二,保持中职的基础地位,是国家脱贫攻坚的需要。对全国9个省份22所中职学校、23所普通高中近3700名学生家庭背景调查发现,中职学生近70%来自农村和乡镇,而近50%普通高中学生来自县城及城市;近90%中职生的父亲的职业多为农民、工人(含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远高于普通高中生;超过80%中职生的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小学、初中,远高于普通高中生;近70%中职生来自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家庭,而近50%普通高中生则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3万元的家庭。为此,国家重中之重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在推进农村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要加强职业教育,逐步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学杂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职教一人,脱贫一家”已成为精准扶贫的长效和长远之策。

第三,保持中职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几个必须关注的事实是:一是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据最新统计,我国现有2.8亿农民工,其中60%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退伍军人的职业教育问题。据权威统计,我国现有退伍军人5700多万并以每年几十万的数目增加,他们大都缺少必备的社会劳动本领和职业技能,就业潜在压力很大。三是残疾人职业教育问题。据第6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2006年残疾人约8500万,占总人口6.34%,国家扶残助残最重要政策之一是特殊教育。据中国残联统计,2017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12个,在校生8466人;残疾人中职(班)132个,在校生12968人,毕业生3501人,其中1802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特殊教育在校生的职普比为6:4。

总而言之,对4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总结,以及对世界工业国家发展经验的比照,有三个重要共识,值得职业教育界同仁共勉。

其一,中等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鉴于国家要继续坚持实体为本,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大政方针,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比例,当下继续实施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依然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理性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根据1991—2015年历年来教育部教育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40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勾勒出这样一条轨迹,即当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职普比下降之日,也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之时。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表明,存在着一种趋势,即在经济下滑时,职普比几乎也同步下滑。两者的枯荣线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十七部门2018年7月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应该健全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以培养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实用人才。

世界工业强国的现状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是各国教育构架的主心骨。权威的2016年瑞士洛桑国际商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榜单前10名中,前9位均为欧洲国家。这些国家2012年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即职普比为62.34:37.36。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7教育概览》显示,国际上大多数实体经济强国,其高中阶段教育的职普比超过50%。例如,瑞士65%、比利时60%、荷兰69%、芬兰71%、挪威50%、奥地利70%、卢森堡61%、意大利56%、澳大利亚58%。2017年12月世界制造强国德国,针对工业4.0提出了《职业教育学校4.0——今后十年德国职业学校创新力和融合力发展》声明。数据显示,当前德国各类职业学校总数为5225所,在校生267万人,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70%。

综上,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坚持实体为本,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中等职业教育是解决“从图纸到产品”这一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形成实际生产力的法宝,是破解如何“创造财富、增强国力”这“最后一公里”距离问题的利器。

其二,中等职业教育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鉴于国家要继续坚持民生为本,以促进就业创业为导向的大政方针,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比例,当下继续实施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依然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理性选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等职业教育是教育优先与就业优先的链接器。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提出“两个优先”:一是“教育优先”,“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二是“就业优先”,“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职业教育是横跨在这“两个优先”之间的当仁不让的教育选择。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成为就业率最高的教育类型。尤其是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以及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职业教育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中等职

业教育已成为民生之本的强大基石,为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中等职业教育是“稳就业”天平的主砝码。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时,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其中,“稳就业”被列为“六稳”之首。这表明,就业稳定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由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影响,就业和扩大就业面临很大压力。目前一个逐渐显现的现象是:中级劳动力需求有余、供给不足导致“技工荒”出现“招工难”,同步又出现高级劳动力需求不足、供给有余的大学生“就业难”。“两难”并存现象继续“发酵”。若一旦失去长期保持高就业率的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中级人才,将使得我国劳动力层级结构成为“哑铃型”甚至更危险的“沙漏型”,导致与合理稳定的“橄榄型”劳动力结构严重失配。

综上,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坚持民生为本,以促进就业鼓励创业为导向,中等职业教育是解决“从学校到工坊”这一生涯门槛跨越难题,提供平滑性过渡的法宝,是破解如何“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这“最和谐生存”空间问题的利器。

其三,中等职业教育是教育公平的润滑剂。鉴于国家要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人皆可成才为导向的大政方针,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比例,当下继续实施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依然是符合国情和规律的理性选择。

教育公平之一是智力类型与教育类型的适配,中等职业教育可为此奠定人生成长的平台。静态地看,智力倾向的测评表明,职业教育学习者常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为此,在人生的同一节点,若能为同一层级的学习者提供即时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的教育选择,更有利于学习的动机导向并增强其学习的自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为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学习者提供最适合其成长的教育类型选择,将使其成为自己一生生涯发展的主宰者。近年来,为我国核心技术发展做出了科学家、工程师无法替代贡献的大国工匠,多数都是中等职业教

育毕业生,他们通过长期精益求精的职业实践的砥砺,升华了技能和精神。例如,国内唯一的载人航天对接机构总装组的组长王曙群,就是一位中职学校毕业生,历经20多年试验—失败—成功—再试验—再失败直至成功的职业实践磨炼,书写了精密装配的奇迹,从钳工成长为特级技师。

教育公平之二是个性需求与教育机会的适配,中等职业教育可为此构筑人生发展的阶梯。动态地看,职业经验的积淀表明,职业教育学习者会产生更高的学习诉求。为此,在人生的不同节点,若能为不同层级的学习者提供及时的多次性而非一次性的教育选择,更有利于需求导向的学习并提升其学习效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为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学习者提供多次的教育机会选择,将使其成为自己终身继续发展的主宰者。近年来,为我国核心技术发展做出了与科学家、工程师同样伟大贡献的大国工匠,很多都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他们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探究学习的深造,提升了知识和素质。例如,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数控加工技术能手李斌,就是一位中职毕业生,通过实践—学习(专科)—再实践—再学习(大学学士),终斩获高端液压泵关键技术,实现了从操作型工人到专家型工人的转变。

综上,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人尽展其才为导向,中等职业教育是破解“从终结到终身”这一发展性路径的难题,构建多维度平台的法宝,是解决如何“纵横捭阖、进退自由”构建“开放教育”时空问题的利器。

当然,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统计口径问题,也需要从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三个维度加以综合考虑。基于“大职业教育观”的审视,一是在横向的教育类型的维度上,中等职业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二是在纵向的教育层次的维度上,中等职业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初中后的职业教育;三是在纵横的教育时空的维度上,中等职业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15~18或16~19岁年龄段的职业教育。因此,除了正规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之外,行业企业、社会教育机构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或培训,以及基于网络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学习等等,应根据其学习内容,并依

据国家标准(期待《国家资历框架》的出台)予以认证后,纳入中等职业教育的统计范畴。

最后,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发展需要与个性发展需要时刻交织在一起而绝非对立的问题。伴随着我们对整个初级阶段深刻认识的新视野,伴随着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势的新反思,伴随着对国家民族复兴全方位的新思考,这一问题会不断地被追问。所以,它既是一个应然问题,又是一个实然问题。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继续深入地改革开放。具体到中等职业教育,要提高其吸引力,就必须在政策上,在制度上,在措施上,包括办学的布局、经

费、评价……,以及个人的就业、深造、待遇……,能真正破除诸多方面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种种束缚,清除一切有意或无意贬低或打压中等职业教育和毕业生的现象,坐实而不是仅仅在宣传或者仅仅只是在每年劳动节的宣传层面高呼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必须让人民通过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有真实的获得感,必须使中等职业教育及其毕业生能真真正正地享受到与普通教育及其毕业生,同等的人生出彩的机会。

凝聚共识,汇成合力,创新发展,迎接挑战。历史,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似乎又给了中等职业教育再一次砥砺前行的机遇。

新时代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再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伟平

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危机愈发严重。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愈发困难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是否还需要中等职业教育?需要什么样的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该何去何从?对上述关键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背景的考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变化,从“有学上”转化为“上好学”,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对优质、多层多样职业教育的需求与不强、不活、不优之间的矛盾。为此,必须基于新时代的新要求,重新审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及其未来走向。

问题一 走向工业4.0过程中,当智能车间里技术工人近一半的工作岗位被工业机器人取代时,我国是否还需要中等职业教育?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率先迈向工业4.0时代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大多仍处于工业3.0,甚至工业2.0时代。应该理性地看到,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离全面迈入工业4.0时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至少在当前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对于整体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水平仍然大有可为。

从我国企业规模结构来看,中小企业仍然占有很大比例,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并没有足够的精力专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这就对中等职业教育产生迫切的人才培养需求。而且,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群体,大多未曾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而又是受工业4.0冲击最大的劳动力群体。为了适应工业4.0时代的新要求,迫切需要中等职业教育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上岗、转岗、轮岗等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再者,即便到了工业4.0时代,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岗位都需要由高职、本科来培养人才,只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变化,需要中等职业教育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培养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问题二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否还需要职业学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主力军到底是谁?是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

需要明确的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不等于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普及攻坚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等职业教育,甚至需要中等职业教育扮演主角。到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中西部贫困地区毛入学率显著提升。实际上,从原有的86.5%提高到90%以上看似只有3个百分点,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这就需要更加明确“精准攻坚”的重要性,即明

确毛入学率的“增长点”究竟在哪里,找到影响毛入学率的“短板”。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中等职业教育在助力“精准攻坚”方面更有优势。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也可以提高农村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还可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但前提是,中等职业教育要提高自己的吸引力,改变自身“二流教育”的形象。

问题三,当 升学 成为职业学校毕业生主要选择时,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例大体相当 的政策底线是否还能坚守?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职学生升学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绝不可以忽视学生的升学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批学生在哪里准备升学?是在普通高中升学,还是在职业学校升学?如果是在普通高中升学,那么没有必要再坚守政策底线;如果是在职业学校升学,那么仍然有必要坚守政策底线。在我们看来,普通高中盲目扩招的问题值得警惕,即便可以为更多学生提供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机会,但在普通高中没有做好全面准备以及系统变革普通教育模式的前提下,这批学生不见得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普通高中,这批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大多处于末段,备受歧视:对待所谓“差生”除增加课时、作业量与加强考试外,普通高中也拿不出更好的“招数”;其结果除了造就更多的“辍学生”“留级生”之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而且即便升学成功,这批学生有很大可能仍旧升入高职院校学习,倘若如此,何不更早地接受更加适合自己的教育?目前各省市试行的“3+3”“3+4”中高、中本衔接升学通道,难道比不上普通高中吗?尤其是有一些技术技能人才“宜早培养”“宜长期培养”“宜贯通培养”,如幼儿园老师、商务外语人才,以中职为起点贯通培养更加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上海市“3+2”中高职贯通模式与“3+4”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所获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种升学模式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如果这样,还会有“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例大体相当”政策底线坚守的问题吗?“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因材施教”的原则永远大于其他教育原则!

问题四,当 就业 不再是职业学校学生唯一的选择时,在中职生涯取向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职业学校该如何办学?

当就业导向职业教育逐渐向高中后教育阶段转移的情况下,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从就业导向转变为生涯导向将成为必然趋势。为此,职业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应该定位于服务学生生涯的多样化发展,让想就业的,都能“高质量就业”;想升学的,都能“升成”;想留学的,都能“留成”;想创业的,都能“创业成功”!为此,必须变革职业学校单一的就业为导向课程结构,探索满足学生多元生涯发展需求的课程结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2+X”课程结构。所谓“2+X”,是指前2年所有学生学习共同课程,第3年在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与指导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不同的生涯发展需求(就业、升学、创业、留学),选修不同的课程模块。对职业学校学生而言,这种新型的课程结构会更加灵活,也更加具有开放性。而且,由于给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也更能满足学生的多元生涯发展需求。

问题五:我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让学生 更容易升学 吗?什么是职业教育真正的吸引力?升学前景,还是职业前景?

在我们看来,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养所需要的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初衷。建立职业教育升学“直通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立交桥”,目的是让有升学愿望和升学潜能的职业学校学生有机会接受继续教育,因此升学无疑会增强职业教育对这部分学生的吸引力。但需要理性地看到,职业教育真正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升学,而是良好的职业前景。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薪酬待遇相当高。如果一线技术工人的薪酬待遇得不到有效保障,即便是能够通过升学获得一纸学历,也将很难获得良好的职业前景。为此,我们建议尽快恢复过去企业曾普遍实行的技术工人“八级技工”制度。那时的一个“八级技工”,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敬慕!如果技术工人薪酬待遇问题无法根本上得到解决,奢谈再多的“行行出状元”“工匠精神”“职业教育吸引力”,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怀”而已。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中,教育的目标就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什么是教育现代化,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不断进步,院校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并非将教育类型都变成普通教育,将院校都变成北大清华,而应是要办好各级各类院校,使教育服务更公平、更优质,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一、职业教育是人人都有成才机会的重要渠道

我国《教育法》的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法》的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习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的批示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教育事业就是为各式各样的人提供成才机会,有些学生适合于普通教育,可以从普通高中进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学生更适合职业教育,可以从中职进入高职和应用技术大学,也可以从中职——就业——继续教育等多种路径的成才。我校软件专业曾经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学生案例,小吉进入我校中考成绩非常优秀,离高中之首的上海中学录取线只差两分,但他酷爱小发明、小制作,需要学习编程,他看中了我校的软件专业,就放弃进重点高中的机会进入我校。在校期间完成了他的心愿——发明一种阅卷笔,这一发明不仅获得国家专利,还获得英特尔国际大赛一等奖,他选择了适合他的教育,毕业时共获得五项国家专利。他的同班同学小洋进入我校是另一种情况,小洋经历了两次中考,第一次没考上重点高中,父母要求他复读一年,但他痴迷计算机,并在第二年以中考语文交白卷的方式对抗父母。父母把他送入我校,与当年的叛逆截然相反的是,他毕业前通过国家软件高级工程师考试,成为上海八大IT企业的“抢手货”。职业教育更加适合另一类学生的学

习,为这类学生的成长成才铺设了道路。

二、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是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通道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人的智能可以分成八个方面,语言智能和逻辑—数学智能较强的学生一般学术性课程的学习力较强,比较适合普通高中的学习,而这两项智能偏弱,强项在另外6方面的学生往往不适合在普通高中学习,其中有不少更适合在中职学校学习。因为,在自然人群中前者比较适合抽象思维,可以先打好语数外等基础再进行专业学习;后者不擅用抽象思维,更擅长在做中学,可以在专业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不断增强基础。实际上,从孩提时代就可以看出,人的学习有不同的路径,同样拿到一个变形金刚玩具,有的孩子是看说明书搞清楚再玩;有的是先玩有问题再看说明书;还有的是边看边玩。

自然人群中各类智能强弱符合正态分布,总体两大类学生比例大体相当。在20世纪90年代我做实验,1993年上海高校录取率还比较低,普通高中毕业生还有不少比例考不上大学,所以我们中专学校还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同时招初中毕业生,学制四年。为了让两种学制兼容,我们试验用2+2模式,即招收初中毕业生进校后不分专业,学习高中的语数外和理化课程,再加上工程类的基础课程,如金属加工工艺、电工电子、化工基础、制图等,前两年中参加全日制高中五门课的会考。六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招入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可以完成高中的主要课程,会考合格率在85%以上,两年后他们选择专业与高中毕业进来的两年制学生合班上课没有显著性差异,与按四年制课程方案教学的学生也没有显著性差异。当年改革的最大优势是缩短了专业选择的周期,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但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完全不同,高校资源开始扩大,我们不再招高中毕业生,就是招收初中毕业生,基本上也都在中考的后50%。我们2+2的模式不再能够适应那样的学生,尽管家长和学生进校时挺想再学高中课程,但事

实很残酷,大量出现学生文化基础课不及格,但专业课学习又非常好,有些学生甚至全国技能大赛拿了金牌,但文化课还有挂科。因此,2000年后我们实行完全学分制模式,让学生在专业学习深入后再补基础,实践证明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人才辈出,我们不仅保持就业率100%,而且每届都有出类拔萃的学生。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学习路径,给学习方式不同于普通高中学生的职业学校学生提供适合他们教育方案,职业教育能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强项,更能够成才。

三、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建议

一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应该打开公务员招考的通道,落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让学生和家长意识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没有层次差异,仅是类型不同。

二是改革高考制度。为了更好地建立职业教育的系统化培养体系,适应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建议应用本科、高等职业院校主体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对今天的高中进行“限流”。这一措施将导致两个结果: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可以到中职修学一年专业课程再上高职(即转变类型);其二,今天的高职和应用本科将自觉对接中职同类专业的课程,加速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使这类人才的培养更加科学。

三是改革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考试方式,今天虽然已开启中职毕业生升学的大门,但选拔考试的方式仍不够完善,往往诱导学生和学校办出专门

升学考试的班级。原因很简单,专业门类多无法组织考试,只能考核文化基础课和部分通用的专业技能,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相同专业毕业生有两类课程,一类是专业教学面向就业,另一类是职教应试课程(专为升学),非常不科学。在大数据时代,完全可以采用学业水平评价替代考试,纠正中职教育两张皮的乱象,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应该一个标准。

四是建立职业技术实验院校。我国在普通教育领域各地都建有实验学校,一般学制在十年左右,为普通教育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实证研究基础。今天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很有必要研究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可以建设若干所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院校,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五是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的基础能力建设。近年来,各地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小,但是历史欠账太多,无论是校舍、实验实训设施,特别是师资队伍依然是中职的薄弱环节,我们应铺设好这条道路,提高办学质量,让学生通过中职的教育实现人生出彩,才能让社会真正认同职业教育是“类型的教育”。

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类型,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一个层次,无论社会多么先进依然需要职业教育,因为它不仅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满足一类人才成长成功的需要。社会越先进,人人都能选择成才的通道越多,人人尽展其才的机会越大,这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追求的教育现代化!

中等职业教育:把升学和就业当作一回事来做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校长 高志刚

中等职业教育应该、有理由和必须高质量健康发展,是无需太多探讨的。当前,中职教育遇到的最大利好因素,是升学道路的不断畅通和向高层次延伸。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升学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在实施教育的时候,难免有重蹈片面追求升学率覆辙之嫌。

老百姓送子女读中职,内心的期盼可以归纳为“既想升好学,又想就好业”,鱼与熊掌得兼。这是一份真真切切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中职

教育工作者应该把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就业,必须追求优质就业,必须伴随学历提升,工学真交替、大交替;升学,必须追求优质升学,始终指向促进就业,有一个好的预期在前方等待,鼓励自我突破。一句话概括:好的中职,就是让学生就业无忧文凭不愁的双满足、真发展。

这需要中职校本身从从属身份过渡到主导身份。以前是为企业输送合格员工,为高校输送合

格生源,中职只要做好这一段的工作;今后要把学生生涯发展、企业用工需求、高校继续深造多方的利益统一起来,为学生、为企业、为高一级学校,量身定做各方满意的育人、用人路径。

在“双满足、真发展”的目标驱使下,中职应努力架构好学生发展的两类路径:一是“学历递升式优质就业”路径,二是“大订单式或融合创新型优质升学”路径。

谈就业,自觉捆绑学历递升。

与优质国企合作,我们推动“2+2”双高(高技能高学历)人才培养模式。如,我校与杭州地铁集团合作,在高二结束后选拔学生送至高职铁路院校共同培养两年,后两年要求获得岗位操作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同时支持获得全日制自考或函授文凭,正式录用一年后报销相关费用。

与优质民营企业合作,创新推出“2+1+1”职后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如,学校与海外海集团合作主管班。高二结束后选拔,高三年段作为见习主管培养,入职一年后,经考核聘为主管或部门副经理。在高三和入职第一年期间,企业组织学历进修,获得文凭后,继续工作满一年,报销全部学习费用。

学校为杭州一些用工量大的主流企业,在金色蓝领本土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创造了多种强化职业技能、重视职业素养、突出职业认同感和企业忠诚度,先优质岗位就业,再在岗位上能力学历双提升的人才培养模式、路径,实现企业和学生的双满意。

谈升学,更多捆绑订单或体现融创特色。

中职应该持续加大“3+2”和五年一贯制这类中高衔接教育的规模。结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衔接班一旦成为升学主力,升学的风向标就容易得到修正。中职可以做好两个发力点:第一,依托、服务强势行业优势企业办中高衔接班。比如我们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共同与杭州市饮服集团创办了烹饪专业的五年一贯制现代学徒制班:三年毕业可以担任技术骨干培养人,五年毕业可以担任储备店长,优质平台、“丰简”自由、任君发展。第二,与认识一致的优质高职专注于联合

培养“跨界融通”人才。如我校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学生,衔接的是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商务英语”学生,衔接的是高职“涉外导游”专业。主要出发点是应对城市和产业发展趋势,着眼未来、布局现在,用跨界融合的人才特色,争取形成“排他性竞争优势”。而与本科一体化办学过程中,中职不能眼里仅仅是本科文凭,而应是学生、行业、产业的发展未来。学校联合浙江科技学院推出的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中职)与建筑电气智能化(本科)的融合培养;学校正与一传媒大学联系艺术与科技跨界的人才合作培养事宜。

未来职业教育要面对的不仅是岗位,更是岗位群,是不断变化的任务链,以及机器不可能胜任的人与人的交流沟通。职业教育培养跨界融合特色人才显得日益重要。中职要思考包括两个方面的跨界融合:

一方面是相邻相近相关行业专业融合。以烹饪专业为例,高素质儒厨要思考三组问题(也就是发展趋势):如何更经典更时尚?如何更健康更细分?如何更科技、更艺术?

另一方面是有技术、会服务、懂管理的融合。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技术技能生存之基是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要学习米其林餐厅,以稳定高质量的服务顾客。大数据分析走心、个性化服务舒心,要学习海底捞,用想象不到的满意粘住顾客。研究顾客成份、消费偏好、天气、社会活动,要学习“7-11”,用一种整体性关联性思维开发顾客。

中职教育不是被动地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更不是一味地满足社会和学生的升学愿望,在当下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应该带有更大的组织性和引导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生涯发展观,引导企业形成良好的人才观,甚至帮助合作企业转型为教育型企业。引进融合优质社会资源,在职业学校汇聚成资源高地,共建共享:基于学生发展,满足企业需求,一起创造一条条就业和升学交融的适合之路,供学生选择、助学生发展。

中职教育,当下特别需要守正出奇,提供社会、企业、家长、学生共需的精准服务;需要有足够的定力,践行适合的教育,拒绝做迎合的教育。

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部门和业态不断替代低科技含量的传统产业部门和业态;二是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三是改造提升制造环节,用精细化生产和流程优化提升加工制造的质量。这三条路径,无论走哪一条,都需要有相应的人才队伍支撑。在中国,提转型升级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效果不彰。不能不说,亟待提升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严重制约;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流动,然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依然严重,高技能人才“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优秀人才严重短缺。在2017年3月召开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办人、总裁郭台铭向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提了个问题。“最近,我们准备组织两万名大学生下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大学生不愿意到生产一线动手和动脑,这其中有观念的原因,也有理论和实践存在差距的原因。现在,有没有什么激励政策,让这些人才愿意去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对此,苗圩回应道:“在制造业中,市场急缺动手操作能力较强的高级技术工人。当前,市场需要的大部分人才还是适用型人才,需要他们到工厂和车间去,能够直接从事生产线方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高技术的工人,中国要想建成制造强国,终究是一句空话。”苗圩接着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也有专门规划,但是调整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涵养人力资源需要时间,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名高级技工需要三年五载,打造一名大国工匠可能需要二三十年。远水解不了近渴。

郭台铭之问,反映出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按照十九大报告给出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不仅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科研人员队伍,而且需要整体人力资本的大幅提升。但需要追问、深究的是,经济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源素质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如果不能明确上述内容,那么将很难讲清楚人才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根源。

回到开头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经济转型升级的第一条路径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13年全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从表面上看,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新方向。但实际上,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对制造业有很大的依赖。而且,“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已经传递出信号,打造高端制造业,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真正方向,这无疑将对制造业相关人才提出迫切需求。经济转型升级的第二条路径意味着在全球劳动分工产业链中由生产环节向研发环节的转移。事实证明,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研发与制造不可分离。美国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造成研发与制造环节的分离,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哈佛大学教授加里·皮萨诺等人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指出,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在此需要引入“产业公地”的概念,它是指根植于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之中的研发与制造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工程制造能力等,这些能力共同为一系列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专注于制造业研发,也绝不能脱离生产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培养能够“下得去”“留得住”的人才。经济转型升级的第三条路径意味着,制造业创新不仅包括研发创新,而且包括工艺创新、流程创新。这种生产过程层面的创新依赖的是有效技能经验的积累,其形成标志并非是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工艺和流程知识,而是具备了在复杂生产情境中解决新

问题的能力,这种技术转化能力的培养同样需要“下得去”“留得住”。

培养人才根本上需要依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作为直接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人才的教育类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无疑承担着更为突出的责任。大学生之所以“下不去”“留不住”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不无关系。高等教育过度扩招导致其过度发展(超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而且高等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存在不重视实习实训、动手能力差的问题。如苗圩部长所言,“30多年前,我们在学校还要到工厂去实习,需要亲自动手操作。现在很多学校已经没有实习安排,大都是纸上谈兵。”高等教育培养出“眼高手低”的大学生,培养不出“千金难买”的技术工人。我国正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转型的基础是企业,如果企业的技术进步缓慢,则会研究影响转型的进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路线与人力资本实现了很好的匹配,即普遍体现为一种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通过近20年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人力资本,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说明已积累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对于创新所应起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使得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之于技术进步、转型升级的应有价值。

再来看职业教育,郭台铭之问也反映出我们国家不少人对职业教育的不重视,没有真正意识到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40年,中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技术工人,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2016年,全国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比为26.4%,比2012年提高2.7个百分点,这表明低技能劳动者群体的整体素质也在稳步上升。然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高中阶段教育中的地位仍然有待提高。高中阶段教育不仅是连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纽带,也是学生成长为技能型人才与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阶段。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接受教育人口数量比例的快速上升而言,高中阶段教育的学校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我们接受教育总是想通过教育提高生

活质量,现实是相当一部分家庭子女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便直接进入社会或勉强进入普通高中,考不上大学然后进入社会,这些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整体缺乏竞争力,择业范围窄、就业环境与待遇较差。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背景下,不少人将其等同于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并未意识到普及攻坚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等职业教育。实际上,中等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它担任着升学、就业、培养全人的使命,是承上启下、进行分流的重要环节。

更为关键的是,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更为明显,立足区域深化产教融合,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一直是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而言,培养“留得住、下得去”的人才,必然离不开中等职业教育,甚至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发挥更大作用。从职校到企业,是新时代青年工人普遍的成长路径。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零基础进厂的“社招”员工,从职校“准员工”规范化的培养到企业提供的平台发展,让青年工人有了更多成长契机和空间。为此,我们建议,要采取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分类指导的方式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尚不发达的落后地区,首要任务是加强基础能力建设,调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比例结构;在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地区,主要任务是深化产教融合、形成办学特色;在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具有较好基础、具备一定办学特色、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较强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区,则应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转型升级培养具有一定创新创业能力的高技能人才。

综上所述,需要理性地看到,从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演进的经验出发,在我国,不管是谋求企业发展的企业家,还是那些有志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政府官员,中等职业教育对于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在短时间内都是难以替代的。当然,上述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提高职业学校办学质量,提升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质量,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观念,使职业学校毕业生投资回报率高于一般普通高中。